

還沒看見，我就聞到了。

人行道和馬路上圍著一群人，有的講手機，有的抽菸，有的正在查看，有的望向別處。大多數是警察。我走來的那個方向，視線正好被他們擋住。起初我心想，街上聚集這麼多制服員警，一定是發生了車禍，再不然就是非法移民遭到逮捕。接著，我聞到了那股氣味。那味道就像你出門渡假前忘了丟垃圾，回家時撲鼻而來的酸臭氣味。味道之強，足以蓋過夏日氣味，像是啤酒和革命的氣味。那股氣味透露了它的存在。

來到距離大約十碼之處，我看見一隻腳。只有一隻，彷彿腳的主人正緩緩踏出豪華禮車。至今那隻腳的影像仍會浮現我眼前。那隻腳穿著廉價懶人鞋，鞋的上方是拉長的灰色襪子，再上方可瞥見發青的肌膚。

他們告訴我，冰寒的天氣把屍體保存了下來，但不知道屍體躺在那裡多久了。也許躺了一整個冬天，一名員警如此推測。凶器是鋤頭，也可能是磚頭，手法並不很俐落，那員警說。他問我要不要看看屍體的其他部分。我說不用，謝謝。那年冬天我的所見所聞已超過我需要的知道的。

妳總是說，我從來不提我在莫斯科的那段日子，也不說我為何離開。妳

說得對，我總是找理由搪塞。很快妳就會明白為什麼。但妳只是不停追問。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回憶老是會浮現，無法阻擋。也許因為距離我們的「大好日子」只剩下三個月吧，不知為何這似乎成了一種懲罰。我覺得我需要找個人說說俄國發生的事，即使會覺得痛也無所謂。並且，妳也需要知道這些事，畢竟我們即將對彼此許下承諾，甚至信守不渝。我想妳有權利知道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用寫的可能容易一些，妳不必費力做出堅強的表情，我也不必看。

所以，我全寫在這裡了。妳想知道我的莫斯科生涯是怎麼結束的，這個嘛，那天下午看見那隻腳，就差不多結束了。但那段生涯的結束其實始於前一年，九月的地鐵站。順帶一提，當我把那隻腳的事告訴史帝夫時，他說：「雪花蓮。你那個朋友是雪花蓮。」他對我說，冰雪融化而浮出雪面的屍體，俄國人稱之為雪花蓮。這類死者多半是酒鬼和遊民，自我放棄而倒在皚皚白雪中，有些則是被兇手藏在積雪之中的受害者。

雪花蓮：腐惡已然存在，一直存在且極為靠近，但你總能視而不見。寒冬掩藏的罪惡，有時永遠不被人知曉。

1.

至少我能確定她的名字。她名叫瑪莉亞·卡伐蘭可，朋友叫她瑪莎。我頭一次見到她，她站在革命廣場地鐵站的月台上。看了她的臉龐大約五秒後，她拿出小化妝鏡舉到面前，另一手拿了一副太陽眼鏡戴上；那時我心想，那副太陽眼鏡可能是她剛剛在地下道某個小攤販那裡買來的。她倚著月台底端的一根柱子，那一處的公民雕像有運動員、工程師、胸部豐滿的農場女工和手裡抱著健壯寶寶的母親。我看了她好一會兒。

在革命廣場站搭乘綠線地鐵會產生片刻錯覺，彷彿那些雕像也要一起登上地鐵車廂。旅客上車時會經過跨越地鐵軌道的架高小走道，一側可以看見

一排碟狀吊燈沿著月台延伸而去，隱沒在列車出現的黑暗之中，另一側可以看見往同樣方向行進的旅客，只不過他們是在另一個不遠處的平行小走道。那天我往右側看去，便看見那個戴太陽眼鏡的女子正往相同方向前進。

我搭上地鐵，站在黃色嵌板和舊式長條形日光燈下，準備前往下一站普希金廣場站。每回搭乘地鐵，這種車廂都讓我覺得自己像七〇年代唐納·蘇德蘭¹主演的某部偏執電影中的臨時演員。到了普希金廣場站，我搭乘電扶梯上樓，上方有狀似陽具的吊燈，然後一如往常，我替後方旅客拉開地鐵出口的厚重玻璃門，接著走進普希金廣場下方宛如迷宮、地勢低矮的地下道。此時，她發出尖叫。

她就在我後方約五公尺處，一邊尖叫，一邊跟後腦繫著馬尾的乾瘦男子搏鬥，因男子想搶走她的手提包（一只招搖虛華的仿 Burberry 手提包）。她高聲呼救，而身旁的女性友人也只是高聲尖叫。後來我得知她的朋友名叫卡姐雅。起先我只站在一旁觀看，但男子揚起拳頭，彷彿就要往她身上揮去，我聽見後方有人發出吼聲，像要出手制止。這時我往前幾步，拉住乾瘦男子的領子往後拖。

男子放開手提包，曲起雙肘向我頂來，但並未頂到。我手一鬆放開了他，他一時重心不穩，跌倒在地。這一切發生得太快，我來不及仔細打量他的長相。他年紀頗輕，約矮我四吋，似乎滿臉羞愧。他踢出一腳，不痛不癢地踢上我的小腿，然後倉皇地爬起，跑出地下道，爬上遠端一道階梯。那階梯通往莫斯科的特維爾大街，大街斜坡從普希金廣場向下延伸至紅場。這條街相當於倫敦最繁華的牛津街，只不過停車亂無章法。特維爾大街的階梯底端附近有兩個警察，但他們正忙著抽菸，找尋可以騷擾的移民人士，並未注意那個搶匪。

「Spasibo。」（謝謝。）瑪莎說。她摘下太陽眼鏡。

她身穿緊得不能再緊的牛仔褲，褲管塞進褐色及膝皮靴之中，白色短衫多開了一顆釦子。短衫外是一件布里茲涅夫時代的滑稽秋季外套，貧窮的俄國女子時常會穿。如果仔細看這種外套，會發現它們似乎是用地毯或海灘浴巾製成，再加上貓毛做成的領子。遠遠看去，穿這種外套的女子像是冷戰時

¹ 唐納·蘇德蘭（Donald Sutherland），一九三五年生，加拿大著名演技派男影星，多飾演動作片人物、怪人，或亦正亦邪的角色。

期驚悚電影中設下美人計的美女。她的鼻子又直又挺，膚色蒼白，留著褐色長髮。倘若她運氣好一點，可能會是那種坐在價格昂貴、天花板貼滿金箔的高級餐廳裡（像是公爵宮或狩獵屋）用餐的女人，嘴裡嚼著黑魚子醬，臉上對著商業鉅子或人脈豐沛的石油富商露出嬌縱的微笑。也許她正是這種女人，只是我持保留態度。

「Spasibo。」（謝謝。）她朋友說，緊緊握住我右手手指。她的手又暖又輕。我揣測那戴太陽眼鏡的女子大約二十出頭（也許二十三），她朋友看來更年輕，可能只有十九歲或更小。她朋友穿一雙白靴、粉紅色假皮革迷你裙和一件相襯的夾克，鼻子嬌小尖翹，金色直髮，臉上露出率真迷人的俄國女孩式笑容，直視著我。這種笑容就像我們曾在義大利里米尼海岸小村教堂裡見過的嬰兒耶穌的笑容，妳還記得那個嬰兒耶穌像嗎？嬰兒耶穌的稚嫩臉龐露出智慧圓熟的微笑，彷彿在說：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要什麼，我生來就知曉萬事。

「Nichevo。」（舉手之勞。）我說。又用俄語補上一句：「妳沒事吧？」

「Vso normalno。」（沒什麼事。）戴太陽眼鏡的女子說。

「Kharasho。」（太好了。）我說。

我們對彼此微笑。我的眼鏡因地鐵裡終年不散的煩膩熱氣而浮起一層白霧。地下道一個CD小販正在播放民謠樂曲，歌詞從酒醉的俄國歌手喉裡迸發出來，聽起來彷彿他打從在娘胎裡就是個菸槍。

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另一場人生中，故事到此為止。那天下午我們互道再見，我轉身回家，隔天返回律師崗位。也許在那一場人生中，我現在仍在莫斯科，說不定我換了份工作留下來，不曾回國，也不曾遇見妳。那兩個年輕女子繼續過她們的生活，遇上另一個人，而這些事會發生在那個人身上而不是我。但我被那種冒險成功的感覺以及做了好事的興奮感給沖昏了頭。我一個殘酷無情的地方做出了高尚的行為，是個無足輕重的英雄，她們將我視為英雄，而我心存感激。

那個較年輕的女子一直把微笑掛在臉上，較年長的女子只是睜眼看著。她比她的朋友高，身高可能有五呎九吋或十吋，她的身高加上鞋跟的高度，使得那一雙綠色眼眸正好對上我的雙眼。那對綠眼眸十分迷人。總有人得說些話，於是她用英文說：「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說：「我從倫敦來的。」我不是倫敦人，妳知道的，但我的老家離倫敦很近。我用俄語問說：「妳呢？」

「我們住在莫斯科。」她說。當時我對這種語言遊戲已習以為常。俄國女人總是說她們想練習說英語，但有時她們也希望讓你覺得你握有主導權，在他們的國家可以安全地使用自己的母語。

又一個微笑的停頓片刻。

「Tak, spasho。」（所以，謝謝你。）她朋友說。

三個人都沒移動。瑪莎說：「你要去哪裡？」

「我要回家，妳們要去哪裡？」

「我們只是在散步。」

「Poguiam。」（那我們散散步。）我說。

於是我們散步。

。 。 。 。 。

九月中旬，俄國人稱之為「老奶奶的夏天」，天鵝絨般的暖意苦苦甜甜地舔上你的肌膚。這種溫暖天候通常在農婦收割莊稼之後來到；如今在莫斯科，「老奶奶的夏天」意謂著能在廣場和保伐路上露天喝酒的最後時節。保伐路是克里姆林宮附近的一條美麗老街道，巷弄間有綿延的公園，裡頭有草地、長椅、知名作家和被遺忘的革命者的雕像。那是去莫斯科最好的時節，但我們可能不會去吧。地鐵站外的攤販擺出了假皮毛中國手套，準備迎接冬季；紅場上的觀光客仍排成長長的隊伍，要參觀列寧墓裡的怪胎秀。午後甚是炎熱，城市裡有半數女人仍穿得十分清涼。

我們從廣場下方的地下道爬上狹窄階梯，來到外頭的亞美尼亞超級市場，接著穿過嚴重壅塞的車陣，踏上保伐路的寬敞人行道。天空除了飄著一朵雲，便只見一縷煙霧從工廠或市區電廠冉冉冒出，在傍晚的藍色天際中格外清楚，十分美麗。空氣中聞得到廉價汽油、烤肉以及肉欲的氣味。